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之三十三

初唐治国特色

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

◎ 叶哲明 著



浙江
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叶哲明 著

初唐治国特色

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

叶春华 题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叶哲明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8-10184-4

I. ①初… II. ①叶…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1532 号

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

叶哲明 著

责任编辑 王 晴

封面题字 叶春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彩 插 2

字 数 35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184-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作者早年阅读唐杜佑《通典》留影



1982年10月唐史年会和浙东籍文史学家傅璇宗、徐连达、郑学檬、齐陈骏等留影扬州定慧寺



1985 年 10 月作者于西安昭陵参加唐太宗学术讨论会与部分学者合影



1992 年 3 月天台山学术讨论会与妻(胡雪芬)在国清寺隋梅名园留影



1995 年 9 月与国清寺
方丈可明大师留影



1996 年 9 月和复旦大学同窗齐陈骏教授北京长城留影



1996 年十月作者参加洛阳武则天国际研讨会合影



2003 年 5 月作者、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时霖先生于
天台国清寺与方丈可明大师听讲法华经典

自序

ZI XU



我之喜爱、学习唐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生史学研究情缘,展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爱国读史的社会人生,激发我撰写《唐自贞观至开元帝制改革》、《唐初儒学治国和中华大一统文化形成》、《东亚海洋文化开拓和日本高僧远渡天台》、《武则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奋斗精神》等论文,并结集成书,光阴如流水,确系赞叹岁月易逝的不朽名言,回首往事,分外感慨,转瞬过去了五十余年。“天下无巧不成书”,在小学启蒙教科书上,开始稚知大唐有个好皇帝李世民,他是我国历史上“百王之冠”,他所治理的贞观治世,誉为“千古之绝唱”,撼动幼小心灵,故乡,故土,童年所带来的知识启蒙,从此播下喜爱和研究的种子,尔后有花有果,其间确有一段颇为曲折离奇,而又令人眷恋的难忘经历。进入初中,父亲因读书很少,又饱尝旧社会商海的酸甜苦辣,主张孩子们读书谋生,讲些他也似懂非懂的三国、唐史人物,激励我们努力奋斗,督促读书习文,近乎严酷。平日少有玩耍,埋头书桌,背后我却喜偷看历史绣像小书《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女皇武则天》、《开元盛世杨贵妃》等,“自古英雄出少年”,敬佩他们的聪明智慧,强烈感染为国为民、英勇杀敌高尚品格之余,在童蒙世界里寻求自己生活乐趣,自始打开了学习唐史的大门,结下一生之缘,写下《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和《三国风云人物》等多部著作。

1953年8月,我有幸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当时系内大师辈出,顾颉刚、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王造时、谭其骧等教授,都是国内一流史学家。他们学风严谨,为人风范,史学思想,体大思精,融合诸家,不泥成说,独创己见;讲学民主,各有特色,堪称学问、人格皆为素养卓然的历史大家。我特爱听谭先生的生动讲课,主修课程就是他的《魏晋隋唐史》和稍后的《中国历史地理》;因为想攻读唐朝文学,大学二年级学年论文《关于李白谪仙之探析》是鲍正鹄教授指导的,颇有好评;毕业论文《唐玄宗杨贵妃恋情和安史之乱》是由谭其骧教授

和徐连达讲师(现为博士生导师)指导的,但我没有写好,有负他的教诲,这更激发我一如既往地把唐史学习和研究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和生活情趣。大学四年匆匆而去,学习、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演变规律,非常钦佩、崇拜司马迁、陈寿、刘知幾、司马光、欧阳修、叶适、吴兢、胡三省、王夫之、赵翼、梁启超等杰出史家为人风范、政治气节,体大思精的渊博学识,正直无畏的史家直笔,也为今后学习唐史,打下一些专业基础。

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频仍,“文化大革命”掀起,人生道路坎坷不平,工作南北颠簸,政治也备遭莫名打击。我因回乡探望母病,引发阶级斗争理论的争议,无故挨批,由南京华东水院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下放徐淮、沂蒙山区劳动,辍学荒废五六年之久,但学史情缘难断,长年累月形成的唐史酷爱,及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的振兴和英雄的崇拜,艰难的劳动生活使我更坚强起来,劳动之余,也翻阅两《唐书》,等待着报考“唐史”研究生,回南京,上北京,重温年青时一段难忘的学史情缘和恋爱旧梦,安慰慈祥的母亲,开拓新的人生旅程。所幸1979和1980年,两次遇到早在复旦读书、情同手足的同乡同窗天台人齐陈骏(后为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忆起当年在复旦校园“小桥流水”苑内,畅谈理想,能有如老师一样对中国史学有所贡献,热泪盈眶,感慨万分。在他的帮助和激励下,我参加了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后又参加西安、洛阳、扬州举办的“中国唐史”等学术讨论会,重燃学习唐史的闪烁火花;特别是聆听史念海、唐长孺、韩国磐、王仲荦、何兹全、吴枫、宁可著名史家,还有一些年轻而又有卓见的师友袁英光、胡戡、徐连达、郑学檬、齐陈骏教授的大会报告发言,受惠不浅,拨正人生行程,毅然转入家乡台州学院(当时为台州师专),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开始撰写《中国唐史讲义》。1982年5月参加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通史讲义》的编写,执笔隋唐部分。《中国通史讲义》198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表《论唐太宗君臣贞观文治和调整统治政策》(1985年9月《唐太宗研究》第一期)。其后参加“中国唐史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唐太宗学术讨论会”、“武则天学术讨论会”、“唐玄宗学术讨论会”、“中国海洋史学术讨论会”……深切体会唐朝在中国及世界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唐史的研究激发我的爱国学史情感,我以“多读书,勤讲书,苦写书”为座右铭,结合教学实践,撰著《中国唐史讲义》,力求在政治史

和人物纪传、海洋海交领域,有所开拓。这次选录自认颇有深度的部分论文,集结而成《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一书。

诚然,我之研究唐史,是因她在世界文明史上重要而独特地位,大唐贞观至开元的一百多年间,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治理国家最出色的时期。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尤以贞观年间,无愧为古今治国之绝唱,历史之奇观,在世界政治、文化思想史上谱写了光辉华章。贞观二十余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大唐在世界历史文明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给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作用、影响和贡献。这批杰出而充满智慧的群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充分发挥最高统治集团在制定方针、政策和执行改革中的不断开拓创新,造成了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大唐帝国,成为世界中世纪最负盛名的封建王朝。史家誉唐太宗为“百王之冠”,贞观时代“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一直成为继起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效仿的表率 and 楷模,大唐是当时世界“文明之邦”。

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和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勣、姚崇、宋璟、狄仁杰、张嘉贞等代表一批地主阶级政治家,其治国最大的历史特色和功绩是大乱之后,坚定地推行“必以文治之。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举天下一之于仁义,为百世不易之道”,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天下道一同风”的中华小康和谐社会:皇帝治国以民本思想,君臣论政倡民主谏诤,难能可贵地从改革封建制度核心皇权帝制入手,探索民为国本、君权民授,辅以均田、府兵、科举、刑律、义仓、政事堂和民族友好、和平交流等一系列革新制度、政策,有效地调动和启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拓中华大一统,谱写了我国历史上由打天下、治天下,而富天下的历史佳话;经济、文化、国力、中西海洋开拓和政治外交诸方面,尤以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都达到历史的高峰。武则天称帝,励精图治,独步古今,是对男权封建社会的极大挑战,并对封建皇权帝制作了重大改革。其所创设的科举殿试,任用女官,扩大和提拔下层庶族入仕为官;重视农业,开辟边塞农田,提倡民可告官的地方吏治改革,较唐初更加开放,更加发展。史学家宋祁、司马光、曾巩、欧阳修、范祖禹等都有极高赞誉:“自周武、成康,历八百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年而后有唐……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唐太宗被誉为“百

王之冠”；武则天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杰出女皇政治家”，唐玄宗缔造开元盛世。遥看封建社会秦至唐，唐至清的前后二千一百多年，历代皇朝不可同日而语，望尘莫及。《唐书》曰：“大唐之治，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虽有周、汉、成、康、文、景之理，无出于此矣！”毫无疑问，唐之后的宋无法比拟，就是汉之文景、建元，明之永乐、弘治，清之康熙、乾隆，也难以匹敌。作为封建皇帝唐太宗、武则天以至唐玄宗，较之之先的隋文帝，之后的宋太祖，就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没有能如他们一样，把中华民族推向世界历史的最前列。当时亚洲、非洲，及至整个世界把大唐誉为“东方文明大国”，治国的表率，以至人类和谐社会的楷模。

翻开中国历史，对世界中世纪历史的文明传播，友好来往，贡献最大、影响最大，诚然是唐朝的贞观和开元时期。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特别是海洋、海运、海交的开拓，促使世界文明大交流，其广度、深度可堪为世界之首篇华章。东亚日本、朝鲜等派出一百多次“遣唐使”，中亚波斯、大食以至北非，直至欧洲西班牙，通过大秦使者，都络绎不绝地派遣留学生、商人、官员到长安，学习大唐文化、文明。试看当时世界，欧洲封建制度刚刚开始确立，七世纪中期建立的法国查理曼帝国，进攻西班牙，吞并意大利，威震四方，为罗马教皇加冕，授予“罗马人皇帝”，曾几何时，旋即分裂，演变成长期的割据战争；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时侵入大英不列颠，建立星罗棋布的小王国，互相兼并，不断战争，有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欧洲刚刚看到封建时代的曙光”。辽阔的俄罗斯，正由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两个不设防城市为中心的小王国，互相竞争，阶级正在分化；至于建立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还要再过三四个世纪，才开始形成。所谓五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正在衰落，昔日繁荣昌盛的东罗马，正为野蛮的日耳曼民族的侵入，而日落西山，摇摇欲坠。总之，唐初君臣所治理的贞观、开元盛世，无愧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先进、最繁荣，并以和合、和平理念，推进世界文明历史向前发展。

大唐治国在我国历史上最为出色、成功，首先以唐太宗为核心统治者集团，提倡谏诤，集思广益，发扬民主，从理论、制度上反思和批判封建的皇权帝制，制定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奉行以儒学为宗，兼融佛道，“安民为先”，发展

生产,促进科技文化繁荣。唐太宗极其难得而令人信服的是一登上皇帝宝座,大宴群臣的第一天,就宣布“以百姓之心为心”,“戡乱以武,守成以文”;从限制皇权帝制入手,进行后宫、储君(太子)、官僚制度的改革突破,创新政策,终于赢得“中国既安,天下大宁”,快速实现由打天下,治天下而富天下,社会和谐、文明,经济发展、繁荣,达到我国历史最称完美的时期。

综观贞观、开元所倡导儒学治国,不仅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孟;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以其“内圣外王”之道,适合时宜地制定、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针、政策和措施,和历朝,特别是和隋炀帝统治时期相比,有下面几方面明显的特色和不同:一,生产性、社会性、文化性的政策措施多于消费性、奢侈性的政策措施;二,发展经济性的政策措施多于政治性、军事性的政策措施;三,在政治经济性政策措施中,缓和安定措施多于急政扰民的政策措施,偃武修文的中外政策措施多于穷兵黩武的政策措施。这些方针政策的改变和调整,高度展示出统治者的聪明智慧、远见卓识,对于急剧变化着的唐初政治经济形势,起着适应、缓和、安定的作用,既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汉族和外族,尤以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为社会持续发展开拓创造出巨大的动力。尤以内庭及官僚制度改革,精妙有度地限制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的贪欲,既能适应当时统治阶级长远利益,也最大限度地顺应和满足了乱后人民群众安定生产和安定生活的迫切要求和愿望。这种民主性而又带有均衡、平和、宁静色彩的理论 and 让步政策,有效保证人民生产、生活,而又不过分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思想,大大激发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政治缓和安定与经济、文化恢复发展的双重效果,唐太宗君臣无愧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最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所导演的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政策的大调整、大改革,无愧为我国封建王朝中儒家民主治国之绝唱。所以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编稿》中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威之世,其文物制度,统传广播,东至日本,西及中亚”,“融会异国,混合古今”,终于赢来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经济繁荣,国家富强,而成为当时世界和平发展的文明大国。

史家于历代“治国以文”,亦有推崇宋朝;实则以治国实效,尤以民本治国、政策制度措施的民主创设,国力强大,社会和谐,首推大唐治国的成功,其所构

建儒家封建治世的民主政制模式,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伟大的开拓和创造。在我国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大胆提出儒家民主治国,民为国本,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并以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调整、改革,缓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中央到地方比较民主的政权、政制,构成大唐前期封建民主政治的模式,开拓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得到人民的高度拥护和支持的封建民主政权,宋朝和其他王朝,是望尘莫及、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模式,虽然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但其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映出统治者难能可贵的最大限度的制约人性的贪欲惰性,展示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才华,值得赞赏和借鉴,某些原理、政策、机制和具体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唐前期治国以文方针,开启我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凝聚、造就了中华民族一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史学家、科技学家,拉开了“王者无外、四海同风”、华夏一统的历史序幕。唐太宗讲:“无隔华夷,诚信如一,日月贞明,煦照著于环宇”。他们继承和开拓两汉以来与各国的友好交往,从陆路、海路铺开中西丝绸之路,通往东亚、西亚、南亚、非洲,以至欧洲的四通八达的天可汗大道,培育了大批精英人才,也推进中外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他们又不断吸取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兼容提炼,演出中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大交流、大融合、大提高的历史壮举。大唐的国都长安、洛阳两京,是当时世界政治重心,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大唐学者、商人、高僧、官吏频繁出使;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商人、高僧、学者、官吏,也不断进入中华,各国的璀璨文明,在大唐舞台融合交流,发扬光大,缔造出中世纪世界历史的文化辉煌。据有关典籍资料,7—9世纪国外涉及唐代有关历史的《行记》、《纪传》、《游记》、《文集》、《省道纪》有七八十种之多,是世界史上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具世界性影响的名著有:公元710—794年日本著名文史学家淡海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或称《鉴真和尚东征记》(有说台州开元寺高僧思托合撰);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行记》,简称《入唐巡记》;新罗留学生崔致远,874年在中国一举及第,曾为溧水县尉、侍御史,著有海交名著《桂苑笔耕集》;还有波斯、大秦及北非阿拉伯人撰写的:阿拉伯人苏烈曼《苏

烈曼游记》；伊本·考尔大贝《道程及郡国志》，他曾任中亚喀巴尔省邮务长官；还有伊本·罗斯德《阿尔阿拉克那非撒》一书，被誉为介绍大唐文明的百科全书。这些书，从不同方面记录、描绘唐朝历史文化、经济物产、礼仪制度、社会太平、城市繁华、杰出人物、名胜古迹、经贸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称誉大唐文明“天上人间，金银铺地，城市繁华，美丽，神往，无论冬夏，都穿丝绸，人民文化素质尤高……”

对海洋的开拓和繁荣，也是大唐文明的一大亮点。唐朝为推进世界文明交流，进一步开拓海洋、海运、海交，把东西丝绸之路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我国东南沿海著名交流港口增加，广州、扬州、楚州、明州、杭州、福州、越州、温州、台州、桂州，尤以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等内陆名城等；誉满环宇，不少成为世界性城市。沿海港口建有市舶司、互市监，专门接待各国来华的使节和客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称广州：“贞观十七年（643），设立市舶司”，是我国最早的海口市舶司。世界各国大批“遣唐使”、“入唐使”等从海道、陆道进入中国，光就日、韩官方和民间史载就有 220 余次。唐玄宗开元期间，“四夷来同，海内宴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亚、西亚、阿拉伯，以至欧洲的大食帝国、东罗马“入唐使”、商客、学者、僧侣蜂拥而入中国。唐中央政府后来还把对外接待政策推及到州县，自由往来，相互平等，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为大唐文化添砖加瓦，缔造中世纪泱泱文明大国。

唐朝进一步开辟出四通八达的海陆丝绸之路，更广、更大、更远，开始波及西非、北非、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特产、商品，也有重大的拓宽和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推进中世纪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提升，使当时世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演进。

唐朝的中西海陆丝绸之路，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有重大推进和拓展。以洛阳、长安两京为重心，构筑而成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及余杭（今浙江杭州），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通往世界各国的海洋海交的新格局。东出东海、黄海，至高丽、日本、新罗诸国；东北经黑水靺鞨到达翰海以北“骨利于国”，及“去京师一万五千里”的流鬼国（即今海参崴一带）；北由回纥向西拓展到黑海以东，西出葱岭至阿姆河地区，及到波斯、大秦；西南可到印度、锡兰，至北非及拂菻（东罗马）等国，间接进入欧洲西班牙地区；向南经

南海可抵苏门答腊、诃陵、婆登等地。此外出海东由广州南行,可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爪哇等南海诸国,以至颇近南极的樺沱洹等,史称商船“来广州,近五月海程”。据《唐书》、《唐会要》所录的国家地区,可考的有 130 多国。著名而有使节来往的如康国(今撒马尔罕)、安国(今布哈拉)、石国(塔什干)、阿国(喀沙尼亚)、火成国(今欧非交界花刺子模)、吐火罗(阿富汗)、波斯(今波斯东)、骠国(缅甸)、天竺(印度)、拂菻(北非、东罗马)、狮子国(锡兰)、罽宾国(克什米尔)、穆国(今马里)、大食(又称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等。

当时我国海外交流航道,已经形成“两路四线”格局,较两汉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历史性的开拓和发展。北路有黄海北线和黄海南线:北线北路由山东登州沿海出发,东北行经辽东半岛,再入西南朝鲜湾,直航日本九州;南路由山东靖海沿海出发,直取朝鲜半岛西岸,再沿岸南下驶进入日本。南路有东海南线和东海北线:南线的基本走向由浙江的明州、越州、台州、温州出发,横越东海,首达日本南方奄美大岛,进入日本。南路北线由江苏的楚州、扬州、苏州沿海出发,横越东海,直达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日本、韩国。特别是南方大港广州的开发,使唐朝和东南亚、南亚、东非等的海上航运出现崭新的局面。

唐代南线广州海运空前活跃,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罕见的盛况,广州成为当时世界性港口城市,出现贾耽所说“广州通海夷道”。可分三段:第一段由广州出发,顺马来半岛直下爪哇;第二段再由新加坡,穿过马六甲到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第三段,由波斯湾头的奥波拉,沿阿拉伯半岛西航,直至红海口,到东非海岸。这就是世界航海史上所说由黄海、东海、南海直达欧、非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海洋著作《南海寄居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传》、《大唐和尚东征传》和日人圆仁《入唐求法巡行记》等,真实反映南北线空前开拓、繁荣,唐朝远洋船队不但已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首次到达红海和东非海域,651 年大食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国王首次正式派使入唐,并辗转远至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国家来中国遣使自 651 年至 798 年的 148 年中,正式遣使达 39 次之多。记录了我国与南亚、东亚、西亚、东南亚以及北非、欧洲的航海活动及经济文化交流的诸多精彩节目。

尤值得一提的是,大唐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明、昌盛的王朝,百家争鸣、百花

盛开、学术繁荣、日月争辉,政治、经济、文化远播中外,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大唐成为世界中西文化繁荣的殿堂。我国的儒学、道学、佛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天文学、地理学、生化学、军事学等大放异彩。一代人物李世民、房玄龄、魏徵、李白、杜甫、王维、智颢、杜佑、刘知幾、白居易、韩愈、李思训、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吴道子、一行、鉴真、孙思邈、唐玄奘……他们的学术思想、著述典籍,流播世界各国,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从东部的日本、朝鲜,至西部北非和东罗马,各国的学者、商旅、艺术家、僧侣,顺着海陆丝绸之路,到世界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洛阳两京和扬州、成都、广州、明州等城市,传播本国的文明和科技,真如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所云:“对中国优秀文化益加叹羨和憧憬,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和模仿,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他们以文化和典章制度为主。”中亚波斯,以及印度、阿拉伯、东罗马等国来中国的学者、富商,也和日本、新罗等国一样,传播,宗教、艺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医药、植物和技艺,造就了以中国为重心的世界文明,“百花竞放、万紫千红”。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相互交流,兼容并蓄,开花结果,大唐是世界历史的主角,为世界世纪文明发展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大唐初期的百余年,尤以开元盛世二十余年,堪称黄金盛世。当时全国人口,唐史著名学者汪钱认为实际已达7000余万(包括在外人口流亡);全国耕地面积已达850万顷;全国有国子监在内生徒60000余人;乡里学校8.91万所;全国水陆驿有1643所;著录书籍达53915卷。疆域辽阔,东起海,西至巴尔喀什湖,西南至喜马拉雅山麓,东北达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霍库次克海海岸,东南包括台湾至南海的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当时国家粮仓堆积如山,光洛阳含嘉仓就有58334000余担,“东都米斗十三钱,青齐五钱”,诚如杜甫《忆昔》所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并非溢美之词。

尤令史家研究,而异常感慨的,开元盛世的二十余年,为历史长河之一瞬,安史之乱悲剧地结束了大唐往昔的强大、繁荣、昌盛,自此步入衰退、败亡的历史进程。百年历史,由大治而为鼎盛,再由鼎盛而为极衰,自此以后,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内外交困,最后演成五代十国,以至宋、辽、金、元的分裂、

混乱时期。开元,这是中世纪封建社会中诡奇错综又发人深省的一段悲剧性的国史。一方面,大家都认识到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发达、最文明的时期,它的稍纵即逝,一下子骤变而为安史大乱,揭示出盛世背后潜藏着严重社会危机,从而走向极衰,大可作为今后振兴中华历史的借鉴和教训。另一方面,唐朝百年确为我们今天振兴中华的一盏明灯,从正面学习其成功经验,开拓我国富强、繁荣、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盛世。当然,开元骤转天宝之乱,其对大唐,以至宋明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逆变影响之大,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引以为鉴。历史实践证明,宋明之后,可以说再也没有出现有如汉、唐盛世。值得思考的是,此一,历史上比安史之乱破坏更大、更广、时间更长、影响更深的,如春秋战国、南北朝混乱之后,并无出现安史乱后长期的历史逆势。二,玄宗和贵妃恋情引发皇族、大官僚、大地主们荒淫酒色的天宝景象,腐败混乱,如汉武、西晋司马、北宋宣和、明嘉靖、清乾隆后期等,也都不一定产生这样的长期历史巨变,并不是“及富必衰”、“鼎盛极衰”,所能概括和解释的。三是安史之乱后,北方衰退,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发展,黄河流域经济衰退,然国家繁荣昌盛,也不是地域的差距所完全决定的。历史运动,应在历史运动中去探索溯源:一方面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地主阶级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开始走向衰退历程,只是我们还缺乏潜在内因研究;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史大家,随着地主阶级内争,宋、辽、金、元战乱,自难提供、产生、出现有如唐初开国辉煌,缔造出新世纪的一批伟大人物;特别是对儒家民主治国,政治、经济、军事理论的开拓和创新。宋明儒学、道学、心学,特别是理学,“以民为本”,开拓不足,滞固有余;恢复和发展、推进小农经济乏力,从政策、制度方面促发资本主义萌芽,开拓历史前进,举步艰难。另一方面,封建中世纪后期地主阶级统治者,很少有如唐太宗、魏徵等这样政治胸怀,以政策制度、治国理论的开拓提升,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使社会陷入更为复杂深刻的矛盾,也解决不了这些矛盾。这些主观、客观,内因、外因相互交错,使我国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在治国理论、政治经济制度、提拔人才政策方面,改革乏力,纵有千百次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以至农民起义反抗,却难引发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剧变、质变;社会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整整沿袭了一千多年。唐初百年历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